

引用:马乾,岳朗,周艳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述评[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7(1):143-149.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述评^{*}

马乾¹ 岳朗¹ 周艳红^{2***} 杨芳艳² 刘若水² 周雅青³ 杜凤娟²

(1.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2.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3.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本草文献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历史上本草文献的语言研究成果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的材料日益丰富,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得以确立,并开展了本草文献今注今译、本草文献数据库建设、本草词汇名实关系考辨、本草别名工具书编撰、本草药名规范整理、本草名物训诂等工作。未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推进本草文献注译工作,深入开展本草文献疑难字考释、用字研究、词汇学等语言学专题研究,关注海外本草文献等。

关键词:语言学;名词术语;文字学;进展;本草文献

中图分类号:R2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24)01-0143-07

DOI:10.13424/j.cnki.jsctcm.2024.01.029

Review on the Language Research of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 Qian¹ YUE Lang¹ ZHOU Yanhong² YANG Fangyan²

LIU Ruoshui² ZHOU Yaqing³ DU Fengjuan²

(1.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2.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anxi Xianyang 712046,China;3.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its language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ich throughout histor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bundant, and the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Work has also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current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database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herbal vocabulary names and reality,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herbal alias reference books,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herbal nam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erbal names and object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can promote the a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aws, 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norms, and conduct in-depth linguistic research on difficult words in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word use research, lexicology,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focusing on overseas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Key words: Linguistics; Nouns and terminologies; Textology; Progress;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2BY12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2019M014);陕西省社科基金委托项目(2021WT11);陕西省教育厅协同创新类重点项目(22JY061);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2JZ03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YJC740108);陕西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9JK0679);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7JZ025);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重点项目(22JT008)

^{**} 通讯作者:周艳红,博士,副教授。E-mail:hzsdzyh86@163.com

本草类中医古籍文献不仅是中医学、中药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也是语言学,特别是训诂学、词汇学关注的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在中医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古代汉语方面的宝贵资料”^[1]。因此,中医文献也是古代汉语研究关注的语言材料。本草文献的语言学价值主要表现在:①本草类中医古籍所载药物名称、病症名称、医方名称、疾患部位名称等为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源学提供了丰富汉语词汇材料;②不同时代的本草类中医典籍所储存的异体字、分化字、通假字等则为梳理近代汉字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汉字字形材料;③历代本草文献的整理、校注、翻译工作则涉及古今汉语语料对译等研究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学界和语言学界借助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训诂学理论与方法对系列本草文献进行了系列语言学专题研究。

1 本草文献的内涵与范围

本草文献与医经文献、医方文献(又称方剂文献)、医案文献、医学专科文献等构成了中医古籍的主体。本草文献特指以阐释药理,辑录药名、药性、功效、产地等信息的中医学文献,现代医学多将这些医书称之为药物典籍,故马继兴^[2]有“药典性本草学古籍”的称谓。这个称谓也揭示了本草文献的内涵。本草文献的产生得益于古人对于本草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中国神话中神农氏遍尝百草、以身试毒的故事影响深远,故秦汉时期的医者托名神农氏编成了《神农本草经》一书。

乾嘉学者多将《神农本草经》视为本草文献之源^[3]。《神农本草经》分为序录和药物分论两部分,前者概述基本药性理论,后者记录药名、药性、功用、产地等内容,创制了本草文献的基本体例。东汉以后的医家们延续神农氏的医德精神,广泛探索药理、药性、药用价值等,并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开展校释、增补、修订等工作,从而产生了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苏敬《新修本草》、宋唐慎微《证类本草》、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系列本草文献。经过传、抄写、印刷、雕刻等传录方式^[4],这些文献前后承继有序,构成了本草文献的主体。

据叶太生、刘萍^[5]统计,国内现有本草文献

800多种。尚志钧^[6]将本草文献分为综合性本草和专题性本草两大类,王家葵^[7]则分为主流本草(即《本草纲目》之类的综合性大型本草类)、本草旁系(即《食物本草》等专题本草类)、子孙本草(即《本草拾遗》等拾遗补阙之类)、游戏本草(仿本草体例的文章)四类。从本草学术发展史来看,前三类对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影响较大,是本草学研究的重点,同样也是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的重点。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的历史底蕴

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并非无水之源,这源于古代本草著述与研究的优良传统,古代医家在编纂本草文献时,往往注意广泛搜集药物别名、辨证药物名实关系、解释药物得名理据等,这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1 药物别名搜集广泛 程超寰、杜汉阳^[8]指出,同一味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称呼是普遍现象,因此广载药物别名成为本草文献的内容。如,《神农本草经》曰:“胡麻……一名巨胜。”《吴普本草》增收别名曰:“一名方金……一名狗虱。”《名医别录》又曰:“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9]李时珍《本草纲目》专设“释名”体例,除了收录前出巨胜、方茎、狗虱、油麻、脂麻等别名外,又增补了“俗作芝麻”“按张辑《广雅》:‘胡麻一名藤弘’”“又杜宝《拾遗》云:隋大业四年,改胡麻曰交麻”^[10]等内容。李时珍不但继承了前代本草文献的别名材料,还从经史子集及实地考察过程中广泛搜集整理别名材料,并且注明别名出处。如《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大麻”条:“【释名】火麻(日用)、黄麻(俗名)、汉麻(尔雅翼)。雄者名枲麻(诗疏)、牡麻(同上),雌者名苴麻(同上)、苧麻(音字)。花名麻蕒(本经)、麻勃。”^[10]这里李时珍从三国吴陆机《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宋罗愿《尔雅翼》、元代吴瑞《日用本草》等古代文献,以及俗语、实证等增补了“大麻”的别名9条。值得注意的是唐梅彪曾仿《尔雅》体例编撰《石药尔雅》一书,该书汇纂了一批药石别名。

2.2 求证药物名实相应 古今汉语中同名异实、同实别名现象极其丰富,这一点在中医药文献也有所体现。在中药名实关系辨证方面,历代本草文献皆有所尝试。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芡苢”

条下:“《韩诗》乃言苳苳是木,似李,食其实宜子孙。此为谬矣。”^[10]唐苏敬《新修本草》于“黄粱”条下辨证曰:“陶注白粱云:襄阳竹根者是,此乃黄粱,非白粱也。”^[11]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指出,《证类本草》等文献存在“有当析而混者,如葳蕤、女葳,二物而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如南星、虎掌,一物二分为二种……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此寇氏《衍义》之外谬;谓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乃陶氏《别录》之差讹”^[10]等现象。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于“集解”后增设“正误”一栏,对“石蚕”“草石蚕”“白僵蚕”“蚕蛾”等80余组药物的名实关系进行考辨。

2.3 得名理据解释丰富 对于得名理据的解释在《论语》《左传》等先秦文献屡见不鲜,汉刘勰的《释名》更是集大成者。历代本草文献在“序药性之本源,诠病名之形诊”^[12]等内容时,多有对药物得名理据的解释,如陶弘景解释“牛膝”为:“其茎有节,似牛膝,故以为名也。”^[10]苏恭解释“五味子”为:“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咸味,此则五味具也。”^[10]于“胡桐泪”下解释“胡桐律”为:“律、泪声讹尔。”^[10]李时珍撰《本草纲目》时专设“释名”一栏,广泛解释药物的正名、别名的得名理据,如李氏于“牛膝”条下继续释名:“本经又名百倍,隐语也,言其滋补之功如牛之多力也。其叶似苳,其节对生,故俗有山苳、对节之称。”^[10]本草文献中对于药物得名理据的分析来源较为复杂,有的传承自《尔雅》《释名》《字说》古书,有的则源于编者医学实践和目验等。这批药物得名理据的解释是汉语词源学研究宝贵财富。

3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医药专业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不断成立,本草文献语言队伍日益壮大,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草文献今注今译、本草文献训诂研究、本草工具书编撰等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3.1 研究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的研究材料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传世类本草文献语言研究,此类以《神农本草经》《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本草文献的语言研究为代表,其中王玉麟^[13]指出历代本草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即本草名

物训诂,其主要任务即考订名实,厘正错讹和探讨命名之义。二是海外藏本草文献语言研究,这方面以日本仁和寺藏《新修本草》残卷、日本内阁文库藏金陵本《本草纲目》等文献的研究为代表,如尚志钧辑录、校注《新修本草》时重点参考了日本藏残卷,马继兴辑注《神农本草经》时运用了大量日本藏古医书,刘山永、钱超尘等人整理《本草纲目》时均参考了日本内阁文库藏金陵本《本草纲目》。三是出土古医书中本草文献语言研究,马继兴等对敦煌出土残卷《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本草经集注》《亡名氏本草序例》《亡名氏本草目录》等进行了校释。

3.2 研究方法 钱超尘等^[14]指出,陶弘景、苏敬、李时珍等人在编纂本草文献时,“注意解释药物命名的原因及药物的形态与疗效等”“注意揭示药名的声义关系”“解释本草名义,极重实践与目验”,这些原则与方法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本草文献语言研究所继承。钱超尘^[15]进一步将中医训诂研究的方法概括为因声求义、因形求义、因文定义、引文正义等四种,并指出诸多方法中尤以因声求义为最重。在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实践中,专家学者们实际上并非简单运用一种方法,而是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学、方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考量。陈竹友^[16]特别指出,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等中医古籍研究工作要“即符合文理,又不悖医理,方为上乘”。李亚茹、田丙坤^[17]提出,中医学者有必要将中医训诂利用起来,“以中医理论及实践经验为基点,在中医思维引导下进行训诂及实践的结合,其所得的结论或可更贴近著者本真的意思”。这些原则与方法已经成为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界的共识。

3.3 研究成果

3.3.1 本草校注今译有序开展 用当代语言表达、描写是传承、传播本草知识的重要手段,因此,张灿理^[18]等学者多次强调今注、今译工作在本草文献整理与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持续不断。《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点校整理561种(后根据中央指示调整为592种)^[19],其中涉及《本草蒙筌》《本草从新》等;《中国古籍整

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2000)》规划点校整理中医药古籍 300 余种,涉及《质问本草》《食物本草》等^[20];2010 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规划整理 417 种,涉及《本草发挥》《本草纲目易知录》等 58 种^[21]。可以说,伴随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本草类中医古籍整理成绩斐然,其中马继兴辑注《神农本草经辑注》、刘衡如点校《本草纲目》、刘衡如、刘山永完成《本草纲目新校注本》、钱超尘等新校注《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等成为《本草纲目》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尚志钧辑复亡佚的《吴氏本草经》等 19 部本草文献为本草辑佚方面的典范,张志斌、郑金生《本草纲目影校对照》等开启了中医药经典文献点校整理的新样态^[22]。

3.3.2 本草文献数据库持续研发 本草中医古籍数字化可以实现“知识传承脉络、引用关系、疾病史沿革的可视化呈现”^[23],可“促进知识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提高文献的利用价值”^[2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是较早介入中医古籍数字化和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的单位之一。目前涉及本草文献数据库的主要有《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医典藏中医古籍数据库》《中医古籍本草知识库》《中医药古代文献知识库》《博览医书—中医古籍文献数据库》《爱如生·中医典海》《瀚唐典藏·子部集成·中医药文献》等资源,这些数据库中大部分都能做到图文对应,且支持全文检索。近年来,手机端在线学习方式受到热捧,如“中医古籍-中医必读经典书籍在线学习”APP、“中医智库”APP、“中医知识学习工具”APP 等,里面会涉及《本草纲目》等经典本草文献。但限于受众、盈利等多种因素限制,目前尚未看到本草文献专类的 APP。

3.3.3 中药别名汇纂工具书蜂出 民国时期的刘亚农较早从事本草异名、别名搜集整理工作。刘亚农考证辑录了 600 多种中药的主名、别名,其中别名包括土名、方言名、处方用名、简略名等^[25]。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现代中医学与中药学的发展,广泛搜集药物别名成为中医药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冠以“别名”的工具书就有李顺保《中

药别名速查大辞典》(1997)、杨春生《中药药名别名学名大全》(2005)、刘道清《中药别名大辞典》(2013)等近 20 部。此外,苗明三等主编《中药大辞典》(2017)等综合辞书中辟有“别名”一项,专门搜集中药品的别名。

3.3.4 本草药物名物训诂细化 本草名物训诂始终贯穿在本草文献的编修过程中,钱超尘^[26]指出《本草纲目》等释名重视实践与目验相结合,善用因声求义等方法,黄作阵^[27]认为训诂学理论的引入推动了近 30 年以来本草训诂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本草文献整理注释中即有中医训诂学界对疑难字词的关注,如李今庸^[28]对《神农本草经》“彼子”“苦菜”的新诂,对《新修本草》“瓜芦”的考义,李从明^[29]对《本草纲目》中生僻字的考辨,张同君^[30]辨证“剉”“锉”二词所反映的不同中医药炮制方法,刘敬林^[31]考《本草纲目》中“醕”为“醢”的异体字,马乾^[32]考证《神农本草经疏》中“填”为“磳”的异体字等,石开玉^[33]认为《五十二病方》“疾藜”即本草文献中的“蒺藜”。这些研究清理了历代本草文献中储存的部分疑难字词。

3.3.5 本草异形词规范程度提升 本草药名词汇系统中广泛存异形词现象,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本草学知识的现代科学表达和转化。魏佳、李灿东^[34]指出:“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条件,为促进中医药发展,开展中医病名规范化研究势在必行。”科技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单位很早就介入了中药名词的考证与规范化工作,朱建平主编《中医名词考证与规范(五卷)》是该领域的最新成果,适应了“名词的科学性、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以及名词的简明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趋势”^[35]。

3.3.6 本草名词国际化进程加速 名词术语国际标准是中医药走出国门的“通用语言”^[36]。新时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中医药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了本草学名词术语国际化进程。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研究中心等中国科研机构参与研制了近 100 部中医药国际标准,其中中药材术语等 ISO 国际标准,以及《WHO 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等陆续刊布^[37]。这些中医药国

际标准中涉及了一批本草文献中的中药名词、疾病名词、症状名词、疾患部位名词的国际标准表达形式,推动了本草文献所载名词术语的国际化。

4 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本草文献研究已经取得了不菲成就,但是仍有较大研究空间,主要体现在本草文献的校注整理成果较多,但是对于本草文献的语料学、字料学价值关注度不够。围绕本草文献的语言学研究至少可以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

4.1 本草文献新校新注 目前本草文献点校、注释、翻译工作囊括了亡佚本草的辑复整理、传世本草的影印校注、海外本草文献的回归、出土本草文献的校正等,可以说大部分本草文献都已经有了现代点校整理本,部分文献甚至有了外语翻译本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低水平、重复性工作屡见不鲜,部分点校整理本直接使用了某些全文数据库的 OCR 识别结果而鲜有校勘,导致文中错误俯拾皆是。未来本草文献点校整理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推陈出新。

4.1.1 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本草文献校理 盛增秀^[38]提出要“使中医文献整理研究逐步实现‘数字化’,更好地为医、教、研和新药开发服务”。应该说,数字化手段应用于本草文献整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源库基础。如,目前本草文献古籍影像库不断推出,这为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校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本草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则为引文溯源提供了条件,这就可以开展他校工作;近年来中医学学科的发展使得中医学、中药学学科知识不断更新,这也就为本草文献理校奠定了基础。但目前仅有闻永毅^[39]探讨了中医古籍校注数据库模式问题,尚未看到系统的应用数字人文手段开展中医古籍校勘应用案例。在“新文科”“新医科”双新背景下,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手段开展本草文献校理工作恰逢其时且前景广阔。

4.1.2 提升本草文献语言文字使用规范程度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40]。但目前整理点校本本草文献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用字用语现象,如刘衡如点校本《本草纲目》中即存在大

量未见于《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简体字^[41]。1986 年国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提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42]《〈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中明确规定了“表外字不再类推”^[43]。因此,新时期本草类中医古籍整理与出版过程中,简体字本严格遵循《通用规范汉字表》,繁体字本则需遵循《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GB/Z 40637-2021),这就可以解决本草文献中异体字、异形词的字形、词形规范问题。

4.2 本草文献疑难字考释 本草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储存了一批疑难俗字,这导致今人点校整理本中未识、误释、漏释等屡见不鲜,如误拆“𩚑”(“𩚑”的讹字)为炎高,误类推简化“𧈧”(“𧈧”的讹字)作“𧈧”,这些错误直接影响了校注本、数据库、索引、辞书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本草文献语言研究需要集中精力,采用异文比勘、形音义互求等方法考释一批疑难字形,以提高今人研究成果的准确度,促进本草文献的科学阐释与传承创新,也可以服务于近代汉字研究、汉字计算机编码、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等工作^[44]。

4.3 本草文献用字研究 本草文献用字研究,主要包括单种本草文献用字考察、不同本草文献用字差异对比、本草文献综合用字计量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的基础为记录同一个语言单位的不同字形的字际关系梳理等。沈澍农^[45]以“异位字”为理论框架,重点考察了唐以前中医药文献中的通假字、古今字、俗体字、讹误字、避讳字等情况。马乾、周艳红^[46]曾对病症名“殓殓”一词的用字进行全面搜集和考察,涉及《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类中医古籍。实际上,本草文献中的药名用字、疾病名用字、病灶部位名用字、病症名用字等尚缺乏系统梳理。

4.4 本草文献词汇学研究 本草文献中的中草药名词、疾病名称词汇、疾病症状词汇、炮制方法词汇、计量单位词汇等应该是汉语词汇学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内容可以从词汇的构词理据、构词方式、名义关系、词形规范、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个体词汇内涵的古今演变和历时词汇系统的发展等。陈增岳^[47]的《隋唐医用药

籍语言研究》等拓宽了汉语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古汉语研究的层次,为断代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语料。宁静^[48]的《论髀的释义及演变》等文章涉及辞书编纂释义、涉及传统医学词汇和西方医学术语汉译词汇对应等问题,是中医词汇研究的典型。沈澍农^[49]对秦汉简帛、敦煌卷子中舂捣类、剉切类、咬咀类中药破碎加工术语进行了考辨。目前,围绕本草考证的名义关系研究、词形规范整理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构词理据研究、构词方式、翻译策略等尚待全面深入地探究,这就需要词汇语义学、翻译学等研究队伍的介入^[50-52]。

4.5 中外本草词汇翻译研究 目前的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汉文本草古籍文献,实际上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文化圈国家内传抄有大量本草文献。周彭^[53]指出,《本草纲目》早在 17、18 世纪已经传入欧洲,并成为外译最多的中文文献之一。随着《本草纲目》的海外传播,在欧美地区至少被翻译为了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不同的语种,加上东亚地区的日文、韩文、喃字等,该书至少有 8 种国外语言版本^[54-57]。那么在本草文献外译过程中,相关中医词汇的意义产生了哪些变化? 汉文本草文献本身又是一个开放的文本系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越来越多的海外中草药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医学与中药学的内容。那么,如何准确翻译海外中草药名称? 学界对此讨论也不多,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力度。

5 小结

本草文献语言研究是本草学研究重要内容。王永炎^[58]指出:“中医学重视发掘传承,必须对重要的古籍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多方位、高层次的诠释研究,积学以启真,述学以为道,使中医古籍为今人所理解、所应用。”推进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即可助力本草文献的系统化、规范化、多方位、高层次的研究,助力《本草纲目》等文献为今人所理解和应用。期待未来更多的学者加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队伍中来,为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灿理. 中医古籍文献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11.

- [2] 马继兴. 神农本草经辑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758.
- [3] 孙达, 陈烨文. 试论清嘉庆中期的学术与中医学之关联[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42(4): 45-49.
- [4] 焦振廉. 论传录形式与中医古典文献的流传[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5, 38(5): 1-4.
- [5] 叶太生, 刘萍. 中国本草典籍源流考[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9): 4040.
- [6] 尚志钧. 中国本草要籍考[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2.
- [7] 王家葵. 本草文献十八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3, 6-11.
- [8] 程超寰, 杜汉阳. 本草药名汇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1.
- [9] 孙星衍, 孙冯翼. 神农本草经[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71.
- [10] 刘衡如. 本草纲目[M]. 标点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1444, 1069, 7, 1972, 1027, 1238.
- [11] 苏敬. 新修本草[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298.
- [12] 张瑞贤, 张卫, 刘更生. 神农本草经译释[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653.
- [13] 王玉麟. 本草名物训诂源流述略[A]//北京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摘要汇编[C]. 第二集(81 届-87 届). 北京: 北京中医学院, 1987:117.
- [14] 刘衡如, 刘山永, 钱超尘. 《本草纲目》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2085, 2086, 2090.
- [15] 钱超尘. “中医训诂学”讲座(第三讲)[J].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3(4): 40-44.
- [16] 陈竹友. 简明中医训诂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136.
- [17] 李亚茹, 田丙坤. 论中医训诂的重要性及发展问题[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42(2): 34-36.
- [18] 张灿理. 中医古籍文献学[M]. 修订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12.
- [19] 张如青, 唐耀, 沈澍农. 中医文献学纲要[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996:10-12.
- [20] 张效霞. 医海探骊[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2: 252.
- [21] 杨东方, 李良松. 典籍文化与中医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7:199.
- [22] 代涛. 医学信息学进展[M]. 北京: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2020:126.

- [23] 丁侃.古籍整理数字化: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密钥[N].团结报(北京),2021-09-18(005).
- [24] 董少萍,崔云.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建构[A].中华医学会第十一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论文汇编[C].安徽: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2005:212.
- [25] 裘沛然.中国医籍大辞典[Z].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16.
- [26] 钱超尘,温长路.李时珍研究集成[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900-953.
- [27] 黄作阵.当代中医训诂名家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08.
- [28] 李今庸.古医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303-306,309-310.
- [29] 李从明.《本草纲目》字词句研究[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6.
- [30] 张同君.“剡”非为“铨”[J].医古文知识,2004(4):20-21.
- [31] 刘敬林.《本草纲目》“醅”字音义[J].中国语文,2011(3):286.
- [32] 马乾.中医古籍疑难字辑考[J].励耘语言月刊,2021(1):168.
- [33] 石开玉.《五十二病方》中的“疾黎”考证[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6):49-54.
- [34] 魏佳,李灿东.中医病名规范化研究现状与对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3):1217.
- [35] 刘青.考证术语名实 支撑术语规范[N].中国中医药报,2022-01-09(008).
- [36] 李静,任冠华.中医药名词术语国际化现状与思考[J].中国标准化,2021(19):101.
- [37] 王晶亚,李慧珍,宗星煜,等.中医药国际化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4):1855-1859.
- [38] 盛增秀.勵志斋医论选[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408.
- [39] 闻永毅.面向信息自动抽取的中医古籍校注方法探索[J].河南中医,2021,41(4):503-507.
- [40]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语言文字规范标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
- [41] 马乾,周艳红.中医古籍整理中的汉字字形处理原则[J].中医典籍与文化.2021(1):157-169.
- [42]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总表[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1.
- [43] 王宁.《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5-47.
- [44] 周艳红,马乾.论中医古籍在近代汉字研究中的价值[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2):41.
- [45] 沈澍农.中医古籍用字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46] 马乾,周艳红.释“殄殢”[J].北斗语言月刊,2021(1):99-107.
- [47] 陈增岳.隋唐医用古籍语言研究[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6:7.
- [48] 宁静.论裸的释义及演变[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1(4):279-283.
- [49] 沈澍农.中药破碎加工术语丛考——以简帛到卷子为中心[J].现代中医药,2020,40(2):9-17.
- [50] 李兵,张林,詹志来,等.经典名方历史衍变与关键信息考证的共性问题探讨[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3,29(1):1-8.
- [51] 詹志来,张华敏,黄璐琦.经典名方药物考证关键问题分析与要点建议[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2,28(10):1-10.
- [52] 迟显苏,赵海军,王媛,等.基于文献考证及物质基准评价探讨中医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2):643-647.
- [53] 周彭.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二十四讲[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54.
- [54] 张焱,王燕丽,李枫.《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与译介研究[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4):12-20.
- [55] 沈忱,陈卫平.《本草纲目》对日本、朝鲜医药学界影响的比较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0(2):183-185.
- [56] 张晟星.《本草纲目》的翻译与传播[J].上海科技翻译,2003(1):55.
- [57] 张李赢,任荣政.从《本草纲目》罗希文译本探讨语境理论指导下的中医古籍英译策略[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2):235-238.
- [58] 王永炎.在诠释中创新[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1(8):702-704.

(修回日期:2022-10-04 编辑:巩振东)